歷史教科書的敘事是學生區分誰才是擁有同一歷史的族群、建構現代社會文化記憶與認同的重要一環，尤其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加強對澳門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敘事研究意義深遠。由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高中教育階段社會與人文基本學力要求》聯合出版的《中國歷史》是澳門高中必修課程中國歷史科的教科書，也是澳門高中目前使用範圍最廣的中國歷史科教科書。可以說，以澳門高中《中國歷史》教科書（下文簡稱《中國歷史》）為對象開展敘事研究具有典範性的意義。

# 第一節 研究緣起

## 一、歷史潮流：國家統一對澳門歷史教科書的訴求

在世界快速發展和變革的時代背景下，國家統一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命運相連、休戚與共。面對變化莫測的國際形勢，維護國家和平統一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與澳門息息相關的是，自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並率先在港澳實踐以來，在中國語境下，如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完善「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事關重大。[1] 眾所周知，澳門「愛國愛澳」教

1 張建：〈「一國兩制」與中國現代國家歷史進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為視角〉，載於《港澳研究》第 1 期（2019），頁 51–60；94–95。

育深入民心、卓有成效，「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維護國家統一做出重要貢獻。在「愛國愛澳」的歷史教育中，澳門高中歷史科教科書作為民族文化和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引人探究。

## 二、重要載體：歷史教科書對記憶與認同的建構

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是宣傳民族精神、塑造國民身份及建立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沙培德（Peter Zarrow）認為：「歷史教科書連同一般的教科書在內，都是現代社會文化記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教科書將『認同』烙印在族群敘述裏，有了認同的族群敘述，就成了歷史敘述，有了歷史敘述，才可以清楚區分誰才是擁有同一歷史的族群，所以族群敘述就是在這種同一歷史敘述下建立了認同。此外，文化記憶打造社會價值觀所依據的基礎，正是族群所具有的知識和符號。」[1] 換言之，歷史教科書對於解決澳門同胞「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問題，建構共同記憶，區分「自我—他者」與「歷史—當下」的認同危機至關重要。更進一步而言，保羅．利科（Paul Ricoeur，也譯保羅．利柯）認為，這種歷史的「回憶」與其說是「建構」的，不如說是發現的。[2] 這種「回憶」使人們看到了一個未來，因為它在過去與現在的每一種關係中都發現一種「意義」，即

1 沙培德：〈知識傳播與集體認同之載體：歷史、記憶、教科書〉，載於李帆、韓子奇、區志堅：《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論教育及教科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頁 4。

2 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62。

在歷史故事的情節中「延續」的那股力量。[1]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指出這股力量是「以個人命運和集體歸宿的形式從過去繼承過來的」，[2] 正是敘事性將讀者從現在帶回過去，從過去汲取力量指向了未來。這些論斷明確了歷史教科書對建構學生記憶和認同的意義所在，也指明了《中國歷史》敘事的研究方向。

## 三、內在動力：歷史教科書對基本學力要求的契合

對於澳門來說，對教科書的設計具有指導意義的是基本學力要求。澳門《高中教育階段歷史基本學力要求》提出應「優化學生的歷史素養，建構本土情懷與國際視野」，幫助學生建構「對本土和國家的關懷與歸屬感」。[3] 那麼，在其指導之下，《中國歷史》的敘事是否與基本學力要求相契合，如何幫助學生形成對本土和國家的關懷與歸屬感，如何提升教學質量、增強歷史的故事性、連接歷史與學生個體經驗、創設歷史情境及建構學生正確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認同等問題具有可研究的空間。

1 《後現代歷史敘事學》，頁 162。

2 同上，頁 161。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高中教育階段歷史基本學力要求》（2018 年 5 月 28 日），https://www.dsedj.gov.mo/crdc/edu/BAA_senior/despsasc-69-2018-anexo_iv.pdf。〔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14 日〕。

# 第二節 研究意義

## 一、理論意義

### （一）豐富教科書領域研究成果

《中國歷史》是澳門本土編寫的第一套歷史教科書之一，是澳門教材本土化建設的重要一環。對該教科書的現有研究成果較少。加強對該教科書的研究有助於增強對其理解與解釋，了解《中國歷史》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講述歷史，如何實現培養目標，如何體現國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改造國民性並塑造新國民，具有豐富教科書領域研究成果的重要意義。

### （二）拓展歷史教科書的分析框架

當前教科書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論仍較匱乏，對教科書領域研究的發展有一定的局限性。[1] 一方面，澳門歷史的特殊性決定了不能生搬硬套原有的教科書分析框架；另一方面，歷史的敘事性為建構敘事分析框架研究《中國歷史》提供可能。本研究試圖構建合適的敘事分析框架，有助於豐富歷史教科書研究領域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論。

1　王攀峰：《教科書研究方法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頁 114。

## 二、實踐意義

### （一）助力教師對教科書的理解與解讀

敘事學越來越關注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教師作為教科書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如何理解與解讀教科書，如何與教科書、學生進行互動舉足輕重。此外，澳門《高中教育階段歷史基本學力要求》鼓勵校本課程的發展與實施，允許歷史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運用多元方式充實歷史課程的內涵，[1] 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歷史教師解讀教科書的自由。因此，本研究有助於通過敘事分析，揭示隱藏在《中國歷史》文本之中的深層結構、重要主題及敘事特徵，幫助歷史教師正確行使教學自主權，更好地理解該教科書，培養學生積極的歷史認同感。

### （二）為「愛國愛澳」教育提供歷史養分

歷史是國家發展不可缺少的養分，是個體意義建構與國民身份認同的奠基石。[2] 歷史教育作為「愛國愛澳」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生對國情、國史和中華文化認知與理解的重要途徑。本研究以《中國歷史》為研究對象，解構教科書的敘事特徵，幫助教師與學生正確理解教科書的敘事意圖，有利於發揮教科書知識的權威性與客觀性，引導澳門青少年認同民族燦爛記憶，銘記國難史實，處理好本土公民、國家公民及世界公民之間的身份認同，喚起內心深處的歷史使命感與時代責任感，

1 《高中教育階段歷史基本學力要求》。

2 李廣、王奧軒、苑昌昊：〈國難教育、社會創傷記憶與國家形象建構——愛國主義教育視域下日本侵華史料研究的邏輯理路〉，載於《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22），頁 140–148。

對推進「愛國愛澳」教育的繼續繁榮昌盛、澳門青少年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具有重要作用。

### （三）發揮歷史教科書的國家認同功能

不同於普通的歷史讀物，歷史教科書是關係國家利益和國家事權的特殊文化產品，體現了國家意志和國家權力，蘊含着民族文化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是學生形成國家認同的重要媒介。[12] 認同具有連續性，共同的歷史記憶是國家認同形成的最重要支柱之一。[3] 歷史教科書承載的知識自身即一種歷史記憶，並且因其權威性和普及性能夠將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記憶深深地嵌入個體的精神世界。[4] 它具有引導學生形成國家認同的功能。[5] 正如古德林．穆勒（Gotelind Mueller）所言，「歷史教科書，尤其是被官方批准的版本是政府力圖界定和形塑國家記憶，建構一個清晰的民族意象的重要媒介」。[6] 明晰澳門高中《中國歷史》教科書所傳遞的官方知識與歷史意識，可以幫助學生通過歷史教科書找到自身的文化根源，從中理解腳下土地與國族的

1 李帆：〈清季歷史教科書的雙重認同〉，載於《史學理論研究》第 2 期（2023），頁 70–86；158–159。

2 崔允漷、郭華、呂立傑等：〈義務教育課程改革的目標、標準與實踐向度（筆談）——《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 年版）》解讀〉，載於《現代教育管理》第 9 期（2022），頁 6–19。

3 亞歷山大．L．尼基福羅夫、馮紅：〈歷史記憶：意識的建構〉，載《國外理論動態》第 12 期（2017），頁 94–100。

4 劉麗群、劉景超：〈論教科書呈現「他者」的書寫策略〉，載於《教育學報》第 16 卷第 3 期（2020），頁 26–33。

5 張升芸：〈國家認同視角下喀麥隆中學歷史教科書分析〉，載於《非洲研究》第 1 卷（2023），頁 144–163；235。

6 朱大偉：〈獨立建國後新加坡中學國史教科書中的二戰記憶建構〉，載於《軍事歷史研究》第 36 卷第 6 期（2022），頁 83–94。

起源、誰是這片土地的英雄、誰為國家帶來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哪些事件是「重要」的歷史事件。[1]

##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的教科書為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澳門歷史教材．試行版》。本套教材根據《高中教育階段社會與人文基本學力要求》編寫而成，共六冊，自 2018 年出版使用以來得到學校的廣泛認同，2019/2020 學年已有 90% 以上中學採用。[2] 圖 1-1 為其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澳門一直以來都較少開發本土教科書，主要使用中國香港、台灣和內地教科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實行開放的教科書制度。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規定了「教育機構享有教學自主權」，[3] 實際上賦予了學校自由選擇教科書的權利。也就是說，選用或不選用教科書、選擇哪一種教科書全由學校自行決定。另一方面是因為澳門教科書出版的市場狹小，

1 Tan, Sing Ye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istory Textbook",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2 中國新聞網：〈澳門 9 成中學採用新歷史教材 包含澳門歷史發展脈絡〉（2019 年 9 月 23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5463171137141195&wfr=spider&for=pc。〔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10 日〕。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https://www.dsedj.gov.mo/~webdsej/www/edulaw/law_9_2006/content/chap07.htm。〔瀏覽日期：2022 年 3 月 1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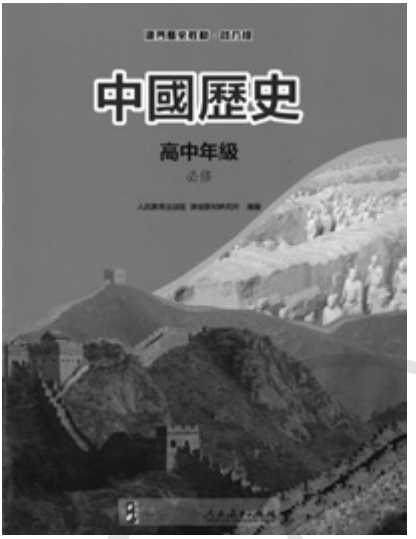


圖 1-1
澳門高中《中國歷史》教科書

需求數量相對有限，導致出版商不願編寫本地教科書。[1] 市場狹小與選擇自由的因素疊加，導致澳門鮮有出版教科書。當然，更深刻的原因還在於此前澳門未有本土的課程框架，課程體系各不相同，作為課程的延伸——教科書當然未有相關要求。

自 2015 年起澳門自小學開始推行澳門本地課程框架及基本學力要求。相應地，為了對接澳門本土課程發展方向，不再依附於外地課程及教科書，澳門特區政府逐漸認識到教科書本地化的迫切性與重要性。2016 年底，澳門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中提出，啟動包括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本地教科書編撰工作。在此背景下，該套教科書應運而生。這套教科書是目前在澳門高中歷史教學中使用範圍最廣、對學生影響最大、學校

1 單文經、黃素君、宋明娟：〈三十年來澳門地區課程政策的理論反思〉，載於《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4 期（2009），頁 75–84。

認同度最高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因而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此外，根據研究需要的角度考慮，高中階段《中國歷史》教科書呈現主題聚焦、敘事特徵明顯等特點，適合於應用敘事研究，因此，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一、文獻研究法

文獻研究法是進行教育科學研究的常用研究方法。文獻研究法又可以稱為情報研究、資料研究或文獻調查，主要指搜集、鑒別、整理、分析以及研究，並形成對事實的科學認識的方法。[1] 它可以概述為五個基本環節：提出課題或假設、研究設計、搜集文獻、整理文獻和進行文獻綜述。[2] 文獻研究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選取適用於研究的資料，並對這些資料做出恰當的分析，歸納出有關問題。[3] 所以，文獻研究法並不是簡單地收集資料，更重要的是分析資料的工作。它既可以是一種單獨的研究方法，又可以作為其他研

1 杜曉利：〈富有生命力的文獻研究法〉，載於《上海教育科研》第 10 期（2013），頁 1。

2 魏順平：〈技術支持的文獻研究法：數字化教育研究的一個嘗試〉，載於《現代教育技術》第 20 卷第 6 期（2010），頁 29–34。

3 〈富有生命力的文獻研究法〉，頁 1。

究方法的研究基礎。[1] 在本研究中，文獻研究法與其他研究方法相互配合，相輔相成。

文獻研究法有以下三個明顯的優點。首先，它超越了時間和空間限制，通過對古今中外文獻進行研究分析可以研究非常廣泛的社會情況。[2] 文獻研究法可以研究那些年代久遠無法再現或接觸不到的調查對象，如已作古的教育學家、已實踐的教育實驗、已發生過的教育現象等，這一優點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具備的。[3] 通過研究已有文獻，研究者可以梳理和總結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前期工作，使我們了解有關的論文選題別人已經做了哪些工作、獲得了怎樣的進展、依然存在哪些問題有待解決，幫助我們確定論文的基點與方向，使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論題，保證論文研究的前瞻性與創新性。[4] 我們還可以從文獻研究中獲得某種啟示、少走彎路、減少盲目性，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權威觀點為自己的觀點提供資料佐證與理論支持，使得研究有據可依，為自己的研究增強說服力、科學性與合理性。[5] 其次，它具有間接性、無反應性的特點。[6] 研究者不與文獻中記載的人與事直接接觸，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沒有任何互動，不會因調查對象不配合而對收集資料產生影響。[7] 最後，它的費用較低，效率較高。[8] 文獻研究是在前人和他

1 吳洪濤：《社會科學「學術自主」論題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23），頁 11。

2 〈富有生命力的文獻研究法〉，頁 1。

3 同上。

4 《社會科學「學術自主」論題研究》，頁 11。

5 同上。

6 〈富有生命力的文獻研究法〉，頁 1。

7 同上。

8 同上。

人勞動成果基礎上進行的調查，是獲取知識的捷徑，不需要特殊設備，所以省時、省錢、效率高。[1]

隨着數字圖書館技術和數字出版技術的不斷發展，文獻儲存、文獻利用和文獻研究的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利於提高文獻研究的全面性和準確性。一般情況下，文獻綜述主要是通過人工閱讀的方式，摘取文獻中的一些重要觀點，並進行系統、全面的敘述，之後加以評論。[2] 在文獻數字化存儲的條件下，研究者可以採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讓計算機來輔助我們「閱讀」大批量的文獻，從總體上呈現一些事實和關係，而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到一小部分文獻進行人工閱讀，大大提高文獻綜述的效率和效果。[3]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作為檢索文獻的主要來源，輔以港澳台學術論文數據庫及外文數據庫檢索核心期刊、碩博論文、高校學報、會議論文及其他論文，採用計算機輔助技術和人工閱讀相結合的方式，搜集並整理歷史教科書、教科書敘事及澳門教科書研究的相關文獻，選擇對本研究有所幫助的文獻進行深入分析，建立對《中國歷史》何以敘事、以何敘事的基本認識並建構適合本研究的敘事分析框架，為本研究的順利進行奠定良好基礎。與此同時，文獻研究法貫穿於本研究的全過程。

## 二、敘事分析法

所謂敘事分析法就是以結構主義方法論為基礎，運用語

1 〈富有生命力的文獻研究法〉。

2 〈技術支持的文獻研究法：數字化教育研究的一個嘗試〉，頁 29–34。

3 同上。

言學分析模式對敘事文本開展研究，明確敘事文本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之間的關係，透過具體的敘事形式和表層結構揭示潛藏其中的價值系統和深層結構的研究方法。[1] 將敘事分析法應用於教科書研究，有助於分析教科書中的敘事文本。教科書的本質是一種包含大量敘事要素和典型故事的敘事文本。雖然教科書具有客觀性和中立性的固有特質，編寫者通常遵守了課程計劃中規定的編寫規則，但他們也擁有相對的自由來解釋這些規則，從而建構歷史教科書文本。這些潛在的解釋為歷史的構建和歷史敘事本身提供了形式。存在於歷史教科書中的敘事概念可能會暴露出一些隱藏的分析維度，引發進一步研究。

敘事分析法作為方法論時與其他研究方法不同。首先，它不是將教科書的部分內容當作研究對象，而是強調研究整本教科書。[2] 其次，歷史教科書的文本特殊性使得歷史教科書的敘事分析具有不同於小說、散文或歷史傳記的特點。一方面，研究者在對歷史教科書進行分析時，必須將教科書的目標讀者納入分析之中。[3] 教師與學生是與文學、史學研究所針對的學術群體截然不同的敘事接受者。另一方面，由於歷史教科書的歷史敘事似乎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神聖的、客觀的和絕對的真理。為了建構敘事統一性，教科書編者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以建構一個清晰而合乎邏輯的歷史敘事，使用與專業歷史學家著書立作時

1 王攀峰：〈教科書敘事分析：理論與方法〉，載於《課程．教材．教法》第 41 卷第 1 期（2021），頁 21–28。

2 Vanhulle, Bert, "The Path of History: Nar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y Textbooks - A Case Study of Belgian History Textbooks (1945-2004)",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38, No. 2 (2009), pp. 263–282.

3 Ibid.

不同的各種修辭技巧，可能因此提供了令人驚喜的分析結果。[1] 最後，敘事分析法不僅僅基於對過去事件、群體、身份的描述，基於對教師的教學後果、學生的接受結果和社會思潮背景的影響的預測和評估，更重要的是揭示敘事結構及其文本作為歷史表徵的影響。

敘事分析法是複雜且多元的。本研究使用敘事分析法的目的不在於區分不同流派的敘事理論和方法論之間的區別，而是更重視敘事作為構建文本的交織紐帶，是如何使用多種敘事概念、結構、修辭、策略等結合起來呈現歷史的。敘事理論的發展歷程、基礎理論及分析應用為本研究提供方法論上的借鑒。

本研究對《中國歷史》的分析以敘事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在認真研讀《中國歷史》的基礎上，基於筆者對敘事理論的掌握，從敘事視點、敘事情節、敘事時間及歷史意識四個方面進行研究。又由於教科書並非孤立存在的個體，它不是在真空中運作的，而是在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運作的。在具有不同要求的複雜系統中運作的教科書需要滿足多種要求，例如認知、學科、制度、教育、政治和社會需求。[2] 因此本研究將聯繫社會文化語境，進一步將敘事語境的探討滲透其中。敘事分析法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更多相關理論基礎和研究框架的探討詳見第三章。

1 "The Path of History: Nar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y Textbooks - A Case Study of Belgian History Textbooks (1945-2004)", pp. 263–282.

2 Tina van der Vlies, "Multidirectional War Narratives in History Textbooks", in *Paedagogica Historica*, Vol. 52, No. 3 (2016), pp. 300–314.